

游山西·读历史

游学

石器时代的山西

杜学文

在我们讨论了人类进化的进程之后,发现山西具有非常重要的地位,显现了中国具有人类形成的独立性。特别是在垣曲发现的世纪曙猿、西侯度与涇河发现的人类用火遗存,以及丁村发现的古人类化石等,均具有文化上的连续性、一致性。以大三棱尖状器为代表的旧石器在这些遗址中均有存在,使这种文化上的一致性表现得非常典型。那么,什么是旧石器时代?是不是还有新石器时代呢?我们知道,石器是人类进化过程中最早使用的劳动工具,也是当时人类能够制造的最先进的工具。由于人类掌握的技术手段不同,石器的制造方法也不同。在早期,人类只会采用击打的方法来制造石器。随着技术的进步,人类逐渐在击打的基础上学会磨制技术,使这些石器工具的功能更加凸显,更好使用。

当人们还只会用击打的方法制造石器工具时,就被认为是处于旧石器时代。一旦能够用磨制的方法制造石器的时候,就进入了新石器时代。尽管不同地域的人们掌握的制造方法并不一致,存在或先或后的问题,但一般而言,大约在距今260万年至距今1万多年左右的时期内,人类主要使用打制的石器,处于旧石器时代。在大约距今18000年左右至距今5000余年到2000余年左右的时期内,人类普遍使用磨制的石器,处于新石器时代。由于各地技术发展不同,使用石器的情况也不同。我们还不能绝对地以时间来划分新旧两个石器时代。但大致来说可以分为这样两个时期。

在旧石器时代,人类制造工具的能力还比较简单。石器是最主要的工具。这一时期,人类已经能够使用火。这是一次人类发展史上极为重要的技术革命,标志着人类由生食阶段进入了熟食阶段,对人的体能、智能的发展有非常重要的意义。此外,人类仍然依靠采摘技术获取食物,依靠捕猎来获取动物充饥,开始使用弓箭等新的工具。出现了简单的艺术形式,对审美有了原始的意识。进入新石器时代,人类制造技术得到了快速进步,可以采用磨制技术使石制工具更为理想化、精细化。农业得到了较快的发展,开始由采摘向种植转化。磨制食物的技术也得到了普及。制陶技术得到发展。一些地区甚至出现了青铜器。

与丁村文化存在的时间大致相当,在山西西北部大同阳高县的许家窑发现了距今约10万年左右的旧石器时代遗存。其中发现了许多动物残骸,以及十多个人类个体的化石遗存。经研究发现,这些人类化石具有形成演化的独立性。此外还有大量的石器工具。其最大的特点是细小石器的出现,直接影响了之后发现的峙峪文化。峙峪遗址大约距今3万年左右,位于朔州桑干河流域。最早由贾兰坡先生等主持发掘。在这里,人们发现了人类枕骨化石、石墨装饰品。引人注目的是发现了大量的动物化石。其中的马、驴类食草动物物占绝大多数。这在旧石器时代的考古发现中极为少见。峙峪的石器遗存中最突出的是箭簇的存在,说明这一带的狩猎技术得到了新的发展。由于这些发现,峙峪人也被称为“猎马人”。峙峪的细小石器承许家窑文化而来,是中国细小石器晚期的代表。其中的尖状器以小型化为主。贾兰坡先生认为,中国北方、东北亚、日本列岛、北美细石器的起源问题将有望在山西北部的桑干河流域得到解决。也就是说,峙峪的细小石器可能存在着向东扩展的现象,直接影响了中国北部更东更远的区域,具有某种国际性意义。

与峙峪文化在时间上比较接近的是晋城沁水县的下川遗址,分布于中条山主峰周边的阳城、沁水、垣曲等地,距今约2.4万年至1.6万年左右。我们在前面已经提到过,下川遗址中发现了石磨等加工农作物的工具,表明这一带的农业发展十分突出,是中国粟作植物原生地的重要实证。在近来的考古发掘中,下川也发现了粟作植物的种子,使这一证据更为可靠。同时,下川发现的石器也非常重要。特别是细小石器,加工细致,工艺复杂。在其它地区发现的三棱尖状器出现了小型化的模式。其中的箭簇采用压制法出锐尖与周边。琢背小刀是其石器中的典型器物。镑状器是下川出现的新的磨制技术制作的最具代表性的石器,与新石器时代东北亚的款式一致,也可以说对其有重要的影响。为探索与之技术传统相同,广泛分布于中国、蒙古、俄罗斯、西伯利亚、日本、北美阿拉斯加等地的细石器文化的起源与发展提供了新的例证。

人们在临汾吉县柿子滩遗址也发现了许多重要的遗存。其存在时间大约为距今1万年至2.5万年左右。柿子滩发现了两幅用赤铁矿赭红色绘制的岩画,应该是我国发现的年代最早的岩画之一,被认为是伏羲与女娲图。此外,还有很多动物化石与烧骨、灰烬等遗存。柿子滩遗址中还发现了大量的石器工具。其中也存在细石器工具。其尖状器等与陕西地区的旧石器有文化上的相似性,表明其相互之间存在不同程度的影响。最典型的是在这里发现了一系列石磨盘。通过对其表面提取物的研究,发现大多为黍类植物,以及根块类、豆科类植物。说明在这一时期,柿子滩一带的农业生产得到了较大的发展。人们的饮食方式出现了新的变化。

通过对这些考古遗存的分析,我们发现,人类的形成,在中国,特别是山西晋南地区具有独立性。同时,旧石器时代中国石器文化具有自己独特的传统,形成了文化的特殊形态。主要是大三棱尖状器与细小石器。可以看出,人们经过漫长的努力,逐渐发展出了新的文化,并对其它地区,包括远东地区、北美地区等地产生了影响。在采集、狩猎的过程中,人类逐渐学会了使用火,对动物的捕获量越来越大,新技术制作的弓箭成为常用的工具。农业由自然形态的采摘向集中采摘转化,并向种植演进。审美功能也逐渐丰富起来。人类将迎来一个新石器与陶器并用的新时代,一个创造了异彩纷呈、斑斓多姿的新文化的时代。

心语

笔墨就该淡淡的

刘 墨



《平安》 尹学华 作

笔墨就应该淡淡的,偶尔的浓重,也只是为了让那种淡淡的墨色显得更为彻底。

恬淡无极,而众美随之。庄子这样说。他所说的逍遥,亦是随意地生活。当然,他的境界太高,我只能理解和做到随意地生活这一点。涂涂画画,慢慢沉淀在笔墨里的,无非

是偶尔所得的浅浅的快乐,忘掉恩与怨,得与失,虽然还偶然有爱与恨掠过心头,但那也不过是藏在心底深处的一个往事,表示曾经为人。我想,弘一的“悲欣交集”,也大概如此。寥寥数笔写意毕,掷笔审视,如果它是让自己喜欢的,大概也类似于一笑而过的淡然吧。

民歌,在我们生息的这块黄土高地上有着对生命本真的理解。这种由民间艺人唱出来的旋律,让我感受了北方荒凉的激情。1986年,一个荒凉的高地上,一位老羊信仰着脖子唱一首信天游。我和同学背着简单的行囊,徒步走在黄土高地上。那时跟我们一起穿越这片高地的还有几位做买卖的小商贩,是他们起哄让山岭上的老汉唱信天游。那位放羊的汉子在激动中扯开喉咙。我听到“引头头骡子带红缨,什么人留下赶牲灵”就已满眼泪水。

初春的上午,这股铺天盖地的苍凉是如此的动心与清静,水洗一样的靛兰至黄赭色的高原连接处,一位头裹羊肚巾的汉子,挥舞着羊铲,我找不出形象解释。一种纯净无言的幸福,就好像是巨大的欢乐被忘掉的一刹那,却已刻在了心里。这是我少女步入青年后获得的一次最彻底的感动。当脆弱的身体和灵魂被一曲“赶牲灵”坚定住后,我明白,晚清大诗人黄遵宪的诗作:“天籟难学也”的出处所在。可以肯定,它改变了我的一生,让我最终选择了由民歌热爱民间。

是不是人心深处总是藏着一些无法说出情感?而这种情感,最深的地方一定会是相思作怪?但广义的相思又会是什么?是不是蓝天大地?当一个人爱了恨了,来了又走了的都是难过时,你会感觉就连无数细小明亮的尘埃也一起合谋来堵你胸怀。我曾一度因流行歌曲泛滥而拒绝接近民歌,最终的接近又觉得它是多么丰富而生动。它情深缘浅的色晕,让我接近了永恒之光。我无法就此而无知地漠视这种伟大而亲切的声音,就像闻见母亲熟悉而温馨,并掺和着些许血腥气味的体香一样,民歌抚慰了我孤独的心。

1997年春天,我与一位来自内蒙古锡林郭勒草上的女子在一起,她说美丽的草原有一种火的品质,草原上到处飘荡着乌珠穆沁长调。她是来自旗剧团的一名演员,她喝一种草原上的高度白酒“套马杆”。她性格爽直,在一次酒醉之后,她给我唱了乌珠穆沁长调《都荣扎那》。那是一首歌唱一个19岁就被杀害了的蒙古族英雄叙事歌,歌里重复着她故乡的星星,无边的草原,还有生命中短暂的沧桑。她把欲望、憧憬凝聚在英雄草原身上,来实现强烈、奔放、壮阔、无奈的生命意识。她满脸是泪,然后盯着我说:“走进草甸深处去,那里还有比生命更纯洁的歌谣。”

《乐记》认为,音乐“能与天地相合,和鬼神相通,使宇宙大放光明,日月运行有序,四时风调雨顺,万物生长繁茂”。可见我们的民族对音乐可称得上是崇拜之极了。

民歌,是一个民族美妙的心声,它以口唱心有一种天然真纯的韵味,它的真切自然往往不是刻意为之的文人诗作所能比拟的,它来自民间切中人类脉膊,无所顾忌的自我精神在民歌中彻底展露。“一对对那个鸳鸯水那上漂,人家的那个都说是咱们俩个好。你要是有那心思咱就慢慢交,你没有那心思呀就么么就拉倒。你对我那个好来我那知道,就像那个老羊疼羊羔。墙头上跑那马呀还嫌低,我忘了我的娘老子你忘不了你。”这种白描性的人骨,由乡下汉子唱出来,所有的想象、

色彩和沉郁的感情,呼吐出了爱情欲望中生活的气息。

能唱民歌的都有一副好嗓子,民歌不能用假嗓唱,但也不能野到天边。要唱好民歌必得一个“情”字,听的人万端抒情辗转才好。民歌一般都有股子酸楚劲儿,现在的歌星把民歌唱得很欢快,连《兰花草》《走西口》之类的民歌都轻浮到了欢喜的套路上。流传在我国的俄罗斯民歌《三套车》:“冰雪覆盖着伏尔加河,冰河上跑着三套车”不说它的歌词,单单那旋律,你不忧郁都不行。歌声中是有画面的,如列维坦的风景画,那么清醒有力,我会想起陀思妥耶夫斯基、车尔尼雪夫斯基,在他们流放的经历里,一架三套车装着他们的文采远去。

二十多年前,朋友送给我一个手摇唱机、一沓红色塑料胶片。手摇唱机摇起来发条格格响,一路听下去,居然有一张苏联民歌,有《红莓花儿开》《山楂树》《三套车》《太阳落山》《英雄夏伯阳走遍乌拉尔山》。歌曲有一种难以表达的,特别是日常生活之外难以捕捉到的精神上的东西存在。我记得第一次学唱《红梅花儿开》是在乡村的一段土路上。地边的玉米秀出了穗,阳光漏射下来,小路空旷,我们的周围不见一个人。这里的“我们”是指我和林娜,一位北京来的知青。林娜悄声哼起一首不太像是我们国家的歌,有一股田野的热气荡过来,令我如此的喜欢。林娜欢快的唱出了它。林娜说这是一首苏联歌曲叫《红莓花儿开》。沙沙沙沙的唱片中,那歌声低沉、缓慢、忧郁,一如清清河水的流速推进,其中它的低音部位很能表达出这首歌的情绪。

我喜欢民歌里唱的那些花事,正月里迎春花儿开,二月里柳絮花儿开,一直唱到十二月腊梅花儿开。所有的花儿都要往头上戴。花开富贵,拽长了大地的年轮。从春天开始,从冬天终结,为一切的存在而存在,四季供她们摇曳,为所有人的快乐存在。“清香那个玫瑰五瓣花儿开,蝴蝶那个恋花啊牵裙那个看呀,啊,鸳鸯那个戏水要郎猜,小小的郎儿呀。”唱到花,都与女人有关,我一直对弱柳扶风型的男人不太欣赏,有时候想,那也能担得起“汉子”的叫法?但我还是相信民歌里藏着一个伟大到张狂的“汉子”。

民歌,人民的歌。好的民歌一定是植物的。沃野千里唱民歌。民歌真是日常生活么?民歌的世事洞明其实是经验的结果。好的民歌阔爽大气,直白坦荡,偏又情致缠绵,余韵不歇。“饥者歌其食,劳者歌其事。”“感于哀乐,缘事而发,出于心胜,激于真情。”一首酸曲唱出来,肚子里的高兴翻出来。民歌,就像故乡有尘土和牛棚、马圈、鸡窝子,犹似地里流汗劳作的爹娘,我找不到合适的感觉,民歌对所有生命的姿态都该是开放的。一切来自民间歌声,都很清激激越,都很激动人心。我去新疆到伊犁,在伊犁河畔,看到维吾尔人和哈萨克人,他们的歌声滑过伊犁河平静的水面,你能感觉那歌声里的快乐是扭动的,他们用快乐化解他们的苦难。鸟一般飞翔的歌声一定能化解一切。

民歌,发自心灵,注满心性,产生于感情。民歌在民间,以另一种口粮来养人和爱情。

随笔

民歌，最先绿过来的春天

葛水平